

2030 上海发展研究丛书

上海人口变迁与展望

SHANGHAI RENKOU
BIANQIAN YU ZHANWANG

主编 杨昕

参编 于宁 高慧 庄渝霞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丛书名：2030 上海发展研究

上海人口变迁与展望

上海辞书出版社

第一章 面向 2030 年的上海城市人口转型	001
第一节 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内涵及外延	003
第二节 人口素质转型的内涵与外延	006
第三节 人口迁移 / 流动转型的内涵与外延	012
第四节 人口分布转型	014
第二章 上海人口转型的理论演绎与实证研究	017
第一节 人口转型的经典理论	017
第二节 人口转型的实证研究	035
第三章 上海人口转型的现实轨迹	052
第一节 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	052
第二节 人口结构转型	064
第三节 人口素质转型	085
第四节 人口流动转型	108
第五节 人口分布转型	132
第四章 2030 年的上海人口展望	164
第一节 2030 年的上海人口规模展望	164
第二节 2030 年的上海人口结构展望	170
第三节 2030 年的上海人口素质展望	182
第四节 2030 年的上海人口迁移展望	197
第五节 2030 年的上海人口分布展望	200



第五章 上海城市转型与创新的重大改革和建议·····	207
第一节 指导原则·····	207
第二节 上海人口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建议·····	227
参考文献·····	246

第一章

面向 2030 年的上海城市人口转型

“城市”，《辞海》中的解释是“以非农业活动和非农业人口为主，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交通、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的聚落。城市的规模大于乡村和集镇，人口数量大、密度高、职业和需求异质性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城市规模超过一定程度时，我们就称之为“都市”。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定义：“大都市亦称为都市区域，由主要城市与郊区附近的城市群组合而成，主要城市在区域经济中心发挥主导作用。”由此，所谓“大都市”就可以理解为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由核心区域、郊区乃至附近其他城市组成的，具有明显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征，具有很强综合功能和复杂的空间形态，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发挥重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影响的城市。上海正是这样一个大都市，其影响力在长江三角洲、东部沿海乃至全国都不可忽视。

20 世纪 30 年代，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上海曾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业务量都雄踞亚洲第一。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欺压，日本侵华战争的摧残，国民党政府溃逃前的搜刮，到解放前期，上海在 30 年代形成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功能受到严重破坏（金济溯，1984）。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战略遏制和经济封锁，上海曾经拥有的贸易、金融、文化交流等功能都难以恢复；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根据当时所

处的国际环境和面临的国内困境,做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针,而上海作为当时全国轻工业基础最好、生产设备最优、技术工人最多、生产工艺最先进的城市,重点发展工业、形成全国制造业生产基地是明智的选择。上海也因此转变为一个功能较为单一的工商业中心城市。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上海与全国一样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成为新历史时期下的主旋律,整个城市呈现出复兴的勃勃生机。特别是 1992 年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在城市管理、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各方面都不断尝试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形成强大的资源集聚与配置能力,力求成为连接内地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在经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后,上海终于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过程中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再次显露出全球性大都市的风采。

回顾城市发展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人”的作用无处不在。城市本身就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成方式,城市的产生都离不开人口的集聚。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各个学科对于“城市”的定义中都含有“人口密集”、“集中居住”等字眼。具体到上海,无论是 20 世纪 30 年代、50—70 年代、80—90 年代,还是进入 21 世纪后的这十多年,上海每一次的华丽蜕变都倾注了全体市民的努力,而这一次次的蜕变也包含着全体市民自身的变化。

本书从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流动及人口分布等方面梳理了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变化,力求从多个角度表现上海人口的转型过程。

第一节 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内涵及外延

人口转变出现距今已两个世纪左右,首先出现在西欧,接着扩散至全世界范围,估计将在 21 世纪之内结束(Lee, 2003)。这一现象大致可描述为:首先是死亡率的下降,接着是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规模的增长则是先加速而后减速,最后是人口老龄化的阶段。具体而言,在全世界范围内,1800 年之前,人类的寿命相对而言是短暂的,伴随着较高的生育率和死亡率,人口规模缓慢增长,人口构成的特征是年轻化。从 1800 年开始,人口情形发生了改变,首先是死亡率下降,然后是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则先上升而后下降,尽管人口规模在不断增加,但是人口构成的特征是老龄化(杨斌,2011)。

经过新中国建成以来的不懈努力,全国各地包括上海的人口增长模式均已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模式,这一增长模式的转变体现了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方向,同时我们也更需关注与人口增长模式转型同时出现的人口结构转型,主要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型。

性别和年龄都是人的自然标志,它们是由人的生理因素和过程决定的,但是对一个地区或国家来说,其人口的性别和年龄结构既有生理因素的影响,更受到社会经济的作用,同时,人口的性别和年龄结构,又反过来影响到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规模、结构以及家庭成员相处方式的变化与转型更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息息相关。此外,人口就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从总人口性别比看,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出生婴儿性别比、各年龄男女死亡率的差异、净迁移人口(即迁入减去迁出以后的人口)的性别比。由于世界各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差别不大,所以出生婴儿性别比对总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基本相同。死亡率对总人口性别比的作用,一般表现为在死亡率越低的国家或地区,男女死亡率的差异越大,总人口性别比就越低;而在死亡率高的国家或地区,总人口性别比也就越高。所以通常发达国家的人口性别比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性别比较高。迁移对总人口性别比的影响表现为,对于净迁出地(即迁出人口多于迁入人口),迁移一般导致总人口性别比下降;对于净迁入地(迁入人口多于迁出人口),迁移一般导致总人口性别比升高。当然,在人口迁移量很小时,迁移的影响可以忽略。

性别结构平衡是人口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的自然基础,而人口性别比不平衡则是转型时期的性别特征。^①分年龄来看,上海人口性别结构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少年儿童性别比偏高,男多女少;二是老年人口性别比偏低,女多男少。

出生性别比是影响全体人口性别构成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定总人口性别比的基础。出生性别比数值一般比较稳定,从全世界情况看,所有国家的出生性别比都大于100,基本上在103—107。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人口从高增长到低增长变化过程漫长,基本没有出现性别比过高的问题;相反,因为人口生育率低、老年人口多、女性寿命长,这些国家总人口性别比多数都低于100,这也是一些国家愿意多引进男性移民以弥补本国人口性别不平衡的原因。我国出生人口

① 央吉:《我国人口转型的现阶段特征》,2009年7月29日,人民网人口频道;学习在线,2009年8月27日。http://www.qzwb.com/study/content/2009-08/27/content_3153134.htm.

性别比偏高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根源,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色彩,生产力水平不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重要物质根源,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环境使男孩性别偏好习俗流行。要消除性别不平衡现象,除了采取必要的治理措施外,还要下大力气解决事实上社会存在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促进人口的深度转型,还要重视降低青壮年和老年男性死亡率,缩小男女寿命差距。

人口老龄化趋势和高龄人口迅速增长是人口转型时期的年龄特征,是人口转型时期出现的重要现象,也是 21 世纪发达国家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老龄化对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劳动力老化、劳动人口负担系数上升、养老问题和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同时,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口高龄化趋势已经凸显。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的进程加速,既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和医疗卫生事业全面进步的重要表现,也是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提高的标志。但同时也使家庭和社会面临严峻挑战。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家庭结构有不同的分类,最通行的分类方法是按家庭的代际层次和与亲属的关系把家庭分为:(1)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和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2)主干家庭,即由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比如由父、母、子、媳所组成的家庭;(3)联合家庭,即由父母和两对或两对以上已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或者是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家庭;(4)其他家庭(以上三种类型以外的家庭)。分类的方法不同,家庭模式的含义也不相同。一般来说,核心家庭人口较少,主干家庭人口居中,联合家庭人口较多。在世界家庭平均人口逐年减少的情况下,核心家庭已经成为各国家庭的主要模式。

就业结构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与资本结合所形成的就业状态。因此,就业结构一方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业人员总体中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的人员比例;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各行业、各地区、各领域的分布、构成和联系。还有一种狭义的就业结构单指社会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分布(边文霞,2009)。本书从人口转型角度进行的就业结构研究着重于结合产业结构的变化分析劳动人口在不同产业之间分布变化。具体而言,就业结构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功能性。就业结构和其他结构系统一样,都有一定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是指就业结构本身在内部与外部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功用和能力。(2)历史性。就业结构是由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决定的,其变化是有阶段、有秩序、有规律的。影响就业结构的不仅有自然条件,最根本的是经济和社会水平。所以,就业结构必须要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先进的历史性发展过程。(3)复杂性。就业结构本身存在着复杂性。就业结构所包含的因素并非简单地罗列在一起,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和法则有序地划分和组合的。

伴随着未来上海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升级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就业结构的转型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产业分布方面向第三产业大量集聚,二是在产业类型方面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样的就业结构转型正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定位相互呼应,推动前进。

第二节 人口素质转型的内涵与外延

人口素质,也称人口质量,是人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综合体现。其中,身体素质是构成人口素质的基础,指人们身

体的先天禀赋、营养状况和后天发育水平；科学文化素质是构成人口素质的核心，指人们经过开发的智力、接受的科学教育以及通过劳动过程而积累的经验和技能（也即干中学）；道德素质是构成人口素质的另一核心，指人们在成长过程形成的人生观、道德观和行为标准。从宏观来看，人口素质取决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产模式及技术进步，人口素质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技术创新的进程；从微观来看，人口素质取决于基因质量的好坏、家庭抚养能力的大小、父母亲对子女的期望以及自身的努力。

人口素质的积累需要时间和资金的投入，这些投入最终成为凝聚在人身上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将获得收益，鉴于人力资本也是生产函数中的重要变量，它也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而且正如复杂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是简单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的倍加一样，拥有较高人口素质的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拥有较低人口素质的人口规模贡献的倍加。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口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生产优势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禀赋、资本和劳动力数量，但现实却是自然禀赋有优势、劳动力众多的国家不一定经济发达，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属于此列。但人口素质高的国家却往往已经或者正在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虽然人口素质的转变往往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发生的，但那些有远见的国家和政府往往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以及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快速发展正印证了这一观点。

人口素质可以是相对概念，存在高低差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之间可以进行横向比较；人口素质也可以是绝对概念，通过一系列

指标进行衡量,由于人口素质的内涵较为丰富,这一系列指标分别测度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从而构成一整套的测量体系。

在人口经济学中,反映人口身体素质的直接指标主要有平均预期寿命、平均死亡年龄、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幼儿死亡率、出生缺陷率、残疾人口比例、青少年身高体重的增长速度等;反映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直接指标主要有成人识字率、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各级教育入学率、每十万人口中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万在岗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人数等;反映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直接指标主要有刑事犯罪率、自杀人数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间接指标也被用来反映人口素质,因为长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指标与人口素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些间接指标包括每万人中的医生人数、床位数、每人每天的热量和蛋白质供应、人均粮食占有量、生均教育经费、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卫生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图书和报刊出版发行量、污染指数等。这些间接指标实际上衡量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提高人口素质所付出的努力。

这许多的直接和间接指标为衡量人口素质提供了多个的维度,成为不同人口总体进行比较时的障碍。为此,学者和权威机构设法构建了若干指数,以期能反映出人口素质的综合水平。

国际上使用较多的综合指数有三个,分别是人口生命质量指数(简称为 PQLI,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美国社会健康学会指标(简称为 ASHA, American Social Health association)、人类发展指数(简称为 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人口生命质量指数,也称为人口质量指数,是由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在1975年提出,1977年正式公布,其目的是衡量和评价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综合人口质量。这一指数由三个指标组成,识字率、1岁时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将这三个指标直接转为或者换算成为0—100的数值,然后求三者的简单算术平均数。计算时,识字率的数值直接计入,1岁时预期寿命以公式 e_1^0 指数 = (实际人口的 $e_1^0 - 38$) / 0.39 (其中 e_1^0 为1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 计算得到,婴儿死亡率则以公式 IMR 指数 = (229 - $IMR \times 1000$) / 2.22 计算得到^①。PQLI指数从0—100,数值越高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素质越高,一般认为低于世界人口质量指数平均值65的属于低素质人口,65—80属于中等素质人口,80以上则属于高素质人口。但这个指数对于发达国家不敏感,而且婴儿死亡率对1岁时预期寿命也是有影响的,再加上仅使用识字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三个指标,因而具有一定局限性。

美国社会健康学会指标相对PQLI有了一些改进,纳入了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ASHA = \text{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times \text{就业率} \times \text{识字率} \times \text{预期寿命} / \text{出生率} \times \text{婴儿死亡率}$ 。该学会规定较为理想的人口质量情况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就业率为85%,识字率为84%,平均预期寿命为70岁,出生率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PQLI指数发布前,1岁平均预期寿命最低是越南,为38岁,以此作为指数的起点0;当时预期寿命上限预计为77岁,即作为100。换算结果,1岁预期寿命每变动0.39岁,在指数上变动1。在婴儿死亡率方面,1950年以来联合国统计记录,最高的是加蓬为229‰,以此作为指数中的0;最低的是瑞典为8‰,当时估计到2000年IMR将降为7‰,以此作为指数中的100。取最高值(229‰)与最低值(7‰)之差除以100得出换算系数为2.22,意即婴儿死亡率每变动2.22个百分点,在婴儿死亡率指数上就变动1。

为 2.5%，婴儿死亡率为 5%，这时 ASHA 的值为 20.23。这一指数用六个指标反映了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素质，在所有具备健全统计资料的国家都可以获得数据，但由于世界很多国家的相关指标都达到甚至超过了理想状态的水平，这一指数的敏感度就大大降低，也就失去比较的价值。

人类发展指数，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若干指标的重构来测量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状态的程度，取代单纯依靠收入指标衡量发展与福利水平的做法。最初的 HDI 是由平均预期寿命、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们国内生产总值构成，分别反映人们的长寿水平、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其中 e_0 指数 = $(e_0 - \min e_0) / (\max e_0 - \min e_0)$ ；教育获得则用成人识字率（2/3 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 权重）共同衡量，即教育指数 = $2/3 \times \text{成人识字率指数} + 1/3 \times \text{综合入学率指数}$ ；生活水平则用实际人均 GDP（购买力平价美元）来衡量，即 GDP 指数 = $[\log(\text{人均 GDP}) - \log(100)] / [\log(40000) - \log(100)]$ 。到 2010 年时，联合国开发署对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改，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取代了识字率，利用预期受教育年限（即预期中儿童现有入学率下得到的受教育时间）取代了毛入学率，同时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取代 GDP 来评估。HDI 在方法论上吸取了 PQLI 合理的内核，又增补了人均 GDP，并用 PPP（\$）进行换算，在知识变量中增加了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可以说 HDI 把 PQLI 向前大大发展了一步。而且，自公布以来，HDI 在构建及各变量最大、最小值的选择上，还在不断完善和变化。

从人口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关于人口素质转型并没有类似“人口转变理论”这样的理论分析框架，但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均展现了

转型的过程。一方面,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47.66岁上升到2010年的69.41岁,粗死亡率从1950年的19‰下降到2010年的8‰^①,与此同时,世界平均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从1985年的75.7%上升到2010年的84.1%^②,高等教育入学率则从1970年时的8.5%上升到2009年的27.07%^③。在身体素质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科学文化素质也同时上升。由此,我们认为,所谓“人口素质的转型”是指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口素质随之发生变化,死亡率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而同一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完成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明显上升。在人口素质转型的过程中,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转变不一定同时同步发生,身体素质的转变可能会先于并快于科学文化素质的转变,最终,身体素质的指标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而科学文化素质的最低衡量标准也会由成人识字率转变改高等教育入学率。

当世界各国人口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各项指标逐渐接近时,就需要将更多的考察指标纳入视野。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衡量人口素质除了直接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各类教育入学率等直接

① 数据来源:“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both sexes combined) by major area, region and country, 1950—2100 (year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http://esa.un.org/unpd/wpp/Excel-Data/mortality.htm>.

②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中心。<http://stats.uis.unesco.org/unesco/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201>.

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5/t20020327_402279629.htm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11/t20120712_402817765.htm.

指标外,还有一些间接指标,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的投入和努力,直接指标的变化代表了人口素质本身的现有水平,而间接指标则可能对未来人口素质带来影响,前者是人口素质转型的基本内容,后者则是基本内容的延伸。

人口素质的提高与转型,最终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为了在人口素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而创新能力是联系两者的重要桥梁,良好的人口素质要通过创新形成更高生产力,进而变成整个人类进步的推动力。从这个角度讲,现有人口素质下的创新能力也应作为衡量人口素质转型与否的判断标准。

第三节 人口迁移 / 流动转型的内涵与外延

人口迁移,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 or 长期性的改变。广义的人口迁移可以分为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狭义的人口迁移仅指户籍迁移,而人口流动则指非户籍迁移。本书所涉及的人口迁移主要是非户籍的人口迁移,也就是未改变常住户口所在地而发生了居住地移动的人口流动。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流动人口的概念仍无明确的定义,全国历次人口普查对流动人口在口径上有一定差异,具体如下: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为“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地”,以及“人住本地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类人群;在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为“常住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及“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类人群;在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流动人口都是指户口登记状况为“居

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以及“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两类人,并剔除其中的市内人口分离人口。

各普查对流动人口定义也有比较一致的地方(陈月新,2009),如:第一,流动人口是指统计时期离开当地研究口径的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统计时的现居住地不是户籍所在地的人口,即现居住地与其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人员;第二,流动人口根据流动方向分为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流入人口是指到该地区的非户籍人口,有统计为外来人口等;流出地人口是指离开该地区到其他地方居住的户籍人口;第三,流动根据流动性和在流入地居住时间分短期流动人口和常住流动人口,短期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时间一般在半年以下,常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时间一般在半年及以上。

本书对上海流动人口的界定是从外省市流入上海而非上海户籍的人口,统称为上海外来人口;在上海居住时间超过半年的外来人口,统称为上海外来常住人口。

本书中主要利用1988年、1993年上海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0年、2010年上海市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05年、2010年本单位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1980年以来,上海外来人口的规模及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等)、流动模式(包括流动原因、流动距离、流动方式、居住时间等)、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包括就业、收入、居住空间分布、住房类型等)、未来意愿(包括居留意愿、利益诉求及城市融入意愿等)的变化趋势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预测2012—2030年外来人口的规模变化,并展望外来人口的新生代群体、总体素质、流动原因、流动方式、居住时间、居住空间、城市融入等变化趋势和特点。